

读史闻世

闻人谈事

# 职虽卑下而道则尊：明代福建教官的担当

□许莹莹

## 陈岱孙： 一生只做一件事

□李湘江

明代福建各府、州、县普遍设学。按制，府学设教授1名、训导4名，州学设学正1名、训导3名，县学设教谕1名、训导2名。若以明万历八年(1580年)以后的稳定建置而言，福建共有8个府学、1个州学、57个县学。那么，额定的各类教官达215人，扣除个别裁革人数，亦在200人之谱。

其中，教授官阶从九品，月俸米五石(皆为流内官中最低)，学正、教谕及训导均为未入流，月俸米大约二石。然而“师儒职虽卑下而道则尊”(《罪惟录·学校志》)，加之朝廷慎选学行兼优的人才，并厉行严密切实的考核，明代福建有不少教官出身举人甚至进士，他们不仅恪尽职责、勤于学政，而且胸怀家国、乐于担当，在地方政治、文教以及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

### “科考”指挥棒下纠空疏之风

就其职责而言，明代教官既受上级主管(即提学官)的领导，又受本府州县主管(即提调官)的管辖，“凡学政遵卧碑，咸听于提学宪臣提调，府听于府，州听于州，县听于县”(《明史·职官四》)。

但由于身处庠序，与生员朝夕相处，教官乃明代教育管理体系的具体执行层，掌管学校一切政务。举凡生员的录取、教学、祭祀、考课、补赠、补廪、奖惩、黜陟、充贡、应举，以及校舍修建、膳食供应等方面学政事宜，皆其职责所在。

细检福建方志中的《名宦传》以及教官家乡方志中的《乡贤传》，评语多从热爱教职、博学广识、严整学风、勤于训诲、因材施教、有教无类等方面，开列其在任教期间的作为与贡献。如蔡智，宣德宁德训导，“立教条，严考课，随才质而程督之”(《清乾隆《宁德县志》)。夏汝砺，嘉靖南平教谕，“其待诸生也，有过即劾之，能改即遇之”(《清顺治《延平府志》)。

值得一提的是，迨至明中晚期，在以科举为导向，学校教育普遍追求“举人及数”，教官考核“以举人有无多寡为黜陟”的大环境下(《明英宗实录》)，福建教官不唯生员举业功课的提高而着眼整体素质的发展，在强调时文制艺的同时，亦注重生员的品行修养。如赵智，成化归化教谕，“始则教以进退揖逊，次则教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行，然后授经讲读，课试文艺”(《明嘉靖《汀州府志》)。林丛，万历同安训导，“每勸诸生以敦本励行为先”(《清乾隆《泉州府志》)。

更加可贵的是，福建教官注意身教，“每论至忠孝大义，击节不已，率身先士”(《闽书》)。教官以身作则，言行一致，对生员思想

品质有很大影响。坚守情操、刚直不阿者如蔡宗宪，正德兴化教授，反复申谕诸生崇尚气节，在学堂之内不行官场跪拜之礼，并身体力行，以为榜样。据清乾隆《莆田县志》记载，一次，御史至儒学视察，宗宪谓诸生长揖而不跪。御史盛怒，欲辱之。宗宪不畏权贵，依然我故，力复古道，受到时人广泛称颂。

其他以安贫乐道、轻财好义等先贤之道修己正身、为人表率者更不胜枚举。如蒋蒙，嘉靖建阳教谕，“食饮脱粟，衣敝不堪。所入俸钱悉以周贫乏，给丧葬。卒于官，篋无余资，丧不能归，闻者悼之”(《清咸丰《琼山县志》)。林腾鹤，万历福宁训导，“诸生修脯，一切却之。捐俸资士，不足则继以家人钗钏”(《清乾隆《福宁府志》)。为资助贫生学业和学校运转，这些教官节衣缩食、慷慨解囊，甚至捐献家人财物，以至生活困厄，贫死异乡，不得归葬。

强调经世致用之学，是晚明福建教官的又一突出特点。明朝对于学校教学内容的要求比较全面，包括“经”“史”“律”“礼”“射”“书”“数”等，旨在培养经世治国、戡乱安邦之才。但由于科举制度日益盛行，许多生员一心只读圣贤书，对于《四书》、本经之外的书毫不关注，形成一股崇尚儒学、鄙视其他学问之风，为害甚烈。鉴于此，福建一些颇具远见的教官以治事为急务、以救世为己任，进行了崇实学、黜浮华的某些努力。

据《闽书》记载，永乐年间，长乐教谕孙大雅“学以实践，不屑章句”，清流教谕方珏“以去浮尚实为弟子师”。迨至嘉靖年间，著名清官海瑞在福建教官任上制定“日课条例”，规定酌量安排“经史稍通，堪居仕列者”诸生，将关系国计民生之边防、水利等事，“每月约讨论一二”(《海瑞集·条例·教约》)，对于纠正当时空疏之风有积极作用。

学政修举，则人才辈出。由于重德行、修举业、崇实学，明代福建在人才培养上成效显著，为国家治理输送了大量合格人才。据研究，明代福建科举在许多方面都处于全国领先地位，诸如人均进士数、人均一甲进士数和人均庶吉士人数等皆为全国第一。这一大批获得科举功名的士人大多来自各府、州、县学，由各级官学培养，他们大多数都走上仕途并卓有政绩。

其他与科举人仕无缘者，则广泛利用教读、行医、经商等平台，融入劳动者阶层，为各行各业发展作出贡献。

### 学政内外“亦官亦师”双肩挑

“推其善教，施于有政”(清道光《晋江县志》)，是明代福建教官于学政之外的重要活

动。明代府州县主官及其副贰佐贰官，作为一府一州一县之“父母官”，掌一府一州一县之政，不可阙员。按《明会典》规定：一旦留有空缺，则由上级另派人署理其事，署理者官衔可高可低，权责一如主官。

教官具有“亦官亦师”的双重身份，虽秩卑俸薄，然心怀苍生，学明行修，因此较其他属官、杂官之流，更受人们尊敬，而常被超擢补缺。由于朝廷明确要求地方官学教师应关心时事，通晓民情，福建教官平日“殫心课士，暇则旁观世务。凡田赋户口之盈缩，徭役讼狱之轻重，风谣俗尚之美恶，山陬海壑之欣戚，靡不究心以备经济”(清嘉庆《惠安县志》)，故临危受命，署政摄篆，往往能得心应手，勤廉务实。

从事迹内容看，其惠政包括治农桑、辟田畴、修水利、蠲租税、兴学校、崇祭祀、毁淫祠、决狱讼、济贫弱、御敌寇等，从不同角度兴利厘弊，惩恶扬善，为维护地方稳定、发展经济、安养百姓和移风易俗贡献良多。

襄助官府，弥补缺位，是中国士大夫的优良传统。在古代，朝廷设官治民一般止于州县，官府行政能力十分有限。明代福建教官以“位卑未敢忘忧国”为念，广泛参与地方各种公共事务。方志中有关教官修桥铺路、赈灾济民的记载十分常见。尤其令人感慨敬仰的是，一些教官铮铮铁骨、凛凛正气，敢于慷慨直言，犯颜进谏，实为后世楷模。

据《闽书》记载，宣德年间长汀教谕陈宗敬“上书言通钞法”，弘治年间上杭训导袁庆云“陈利弊六事于都御史”，这些堪称感时忧国、为民请命的有为之举，在不同程度上都减轻了民间的疾苦。还有一些教官不畏牺牲，在危机时刻，常能爆发出特殊的勇气和力量，出面带头保护地方安全。如明中后期福建倭患严重，福安教谕程箕、训导谢君锡和莆田训导卢允佐等挺身而出，组织民间武装坚持抵抗，直至城陷遇害，壮烈牺牲。

教化行而风俗美，教官是明朝推行社会教化的重要力量。以“乡饮酒礼”为例，这是一项以学校为基地，由官师生担任主要工作人员，通过致敬老贤示范带动全社会教化礼仪活动。终明之世，乡饮酒礼在福建各学都得到较好贯彻。直至明中后期，在社会的巨大变迁和转型中，仍有不少教官在努力坚持。如嘉靖南平教谕海瑞正本清源、激浊扬清，力矫礼仪错讹、宾介冒滥、举废无常等时弊，以保证乡饮酒礼规范有序进行。

这既增添了教官的闲趣之乐，又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杰作佳句。(作者单位：福建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 近代福州尚书崇拜的嬗变

□周至杰 陈妍 文/图

在福州阳岐有一座古朴且庄重的庙宇，庙门上方镌刻着严复1920年亲笔写下的“尚书祖庙”四个大字。这座始建于明朝天启七年(1627年)的尚书祖庙见证了福州尚书信仰数百年的发展演变历程。

福建由于地理位置“背山面海”的特殊属性，海神信仰尤为兴盛。在诸多海神信仰中，福建、台湾和东南亚等地多有“官船拜尚书”，民间信仰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尚书庙始于福州，又以福州为最盛。在福州历史上留存下来的尚书庙便有多处，仅南台一地就有五座神祠：阳岐、万寿、新亭、龙潭和竹林尚书庙。其中以阳岐祖庙和万寿尚书庙地位最高。

尚书庙中供奉的是南宋末年的抗元英雄陈文龙。《明史·礼记·诸神志》记载：“福州祀陈文龙。兴化祀陈瓚……皆历代名臣，事迹显著。”陈文龙因其忠君报国的事迹而被敕建“宋陈忠肃公神祠”并敕封为“福州府城隍威灵公”，列入官方祀典。这便是陈文龙“生为名臣，死为神明”之始。

而真正让陈文龙信仰广为流传并延续至今，须追溯到明永乐年间朝廷敕封陈文龙为“水部尚书”。早先陈文龙与海上女神林默娘一同奉祀在阳岐兴化道旁一小庙里，这或许是陈文龙被奉为海神的最初原型。此时因朝廷敕封，则出现在福州专门建造的“尚书庙”里加以供奉。据《福建通志·坛庙志》记载：“水部尚书庙在泗洲左辅，明初建，祀宋陈忠肃文龙。”此庙即今天万寿尚书庙。

1627年，福州当地村民和莆仙一带的商贾将原兴化道旁的陈文龙神像移至侯官阳岐村凤鸣山之阳新建的尚书庙专以奉祀，即今天的阳岐尚书庙。因其他尚书庙皆由此庙分炉而建，因此称其为“尚书祖庙”。查陈文龙生平未任与水部有关的职务，明朝以后亦无水部尚书一职，但因民众的需求和官方的推崇，陈文龙以“水部尚书”之名而被当地百姓作为“海神”奉祀。

现存于尚书祖庙前的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碑文记载：“祖殿水部尚书三次敕封，加封镇海王。”有专家考证，这三次敕封和加封时间分别为明代崇祯和清代康熙、乾隆年间。可见至有明以来，尚书公就一直扮演着海上保护神的角色。

合江万寿尚书庙中现存的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重建碑刻记载陈文龙“英爽不混，数出入风涛间为涉险者助”“闽地滨海澳区，往

来舟楫，赖公之灵，阴相而默导之，匪一朝夕之故”。反映出福州民众之所以建庙奉祀陈文龙，是认为其能在海上显现神迹，救助遇险渔民、保护来往船只。此时福州崇拜尚书的形象主要是护佑苍生的“海神”。

值得一提的是，尚书信仰之所以受到官方的重视和尊崇，与其在郑和下西洋、中琉交往等海外交往中扮演的角色密切相关。自明洪武始至清光绪朝，朝廷先后派出23次册封使团从福州出发赴琉球。使团为祈求海上行船平安，行前必先至尚书庙祭祀后再启程，有时还将陈文龙造像随同迎往琉球，以供时时祭拜。

清嘉庆年间，福州人齐鲲担任琉球册封使团正使，其在《续琉球国志略》中记录：“船遇暴亦然，文武员弁虔叩尚书神像前，乃免于厄。”现仍存于阳岐尚书庙内的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由琉球册封使团正使、福州人林鸿年题刻的石柱联“神风吹久米，荫跃降瑞桑”，也记述了陈文龙佑护使团平安往返中琉之间。这些记载都说明了陈文龙“海神”信仰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他从“忠贤烈士”到“海上保护神”的身份转变业已完成。

尚书公的形象深入人心，从阳岐祖庙和万寿庙二处留存修建碑文可见。万寿尚书庙清嘉庆壬戌年(1802年)碑文详细记载了来自闽地和琉球大船捐资的情况。阳岐祖庙前的碑文则分别记载了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嘉庆九年(1804年)、道光二十年(1840年)、咸丰九年(1859年)和光绪十年(1884年)先后5次重修尚书庙的情况和捐资者的名单。

这些碑文反映了尚书崇拜从明代一直延续到了近代。尚书公仍是那个水部尚书陈文龙，只是近代的福州已不是曾经的福州。福州的尚书崇拜发生了变化：近代福州人目睹并感受到了国家遭受西方列强入侵的危机，对尚书公的崇拜又回归到报国的精神上来。陈文龙在人们心中从海上保护神变成家国的守护神。

道光三十年(1850年)九月，林则徐被朝廷再次任命为钦差大臣，赴广西督办“事务”，此时他年老体弱，自知此行不济，但面对国家安危又岂能置而不顾。因此赴广西前，他来到万寿尚书庙拜谒，留下了“节镇守乡邦，他景炎残局难支，一代忠贞垂史传；英灵昭海澨，与国陈隆名并峙，天洲清晏仗神庥”的石柱联，把陈文龙与文天祥(曾封为信国公)同奉为“隆名并峙”的英雄。

1919年，严复回到家乡阳岐，到尚书庙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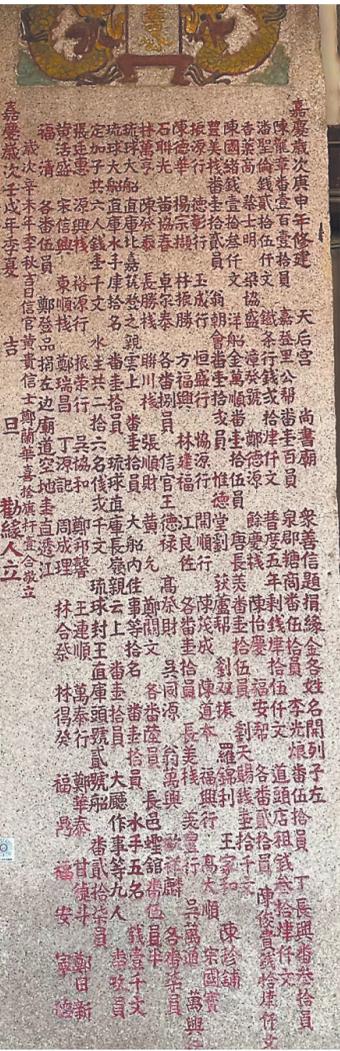
严复题“尚书祖庙”

香时见庙宇残旧破败，便亲拟《重建尚书祖庙募缘告示》，牵头成立董事会募缘重建尚书庙。在他的影响下，福建督军李厚基、省长萨镇冰、帝师陈宝琛、前清知府叶大庄等人均有善捐。1920年尚书庙开始重修。在此期间，离闽北上的严复与三儿严琥、侄儿严廉瑞的家书中，几乎每一封都有提及尚书庙的修缮事宜，“尚书庙事进行如何？盼翁吾侄随时通信而已，此事令人放心不下也。”“知翰甫已开董事会，不识大家决议如何？事已定何日开工？”在修建过程中，经常叮嘱家人前往督办：“前云八月动工，乃今已重九矣，更有何辞延宕耶？所以延宕之故，到底情形如何，儿可查明告我。”

1920年1月7日，得知尚书庙上梁大吉，远在北京的严复还郑重地在日记中写下：“本日，阳岐尚书庙上梁。”同年10月底回闽后，严复虽身体状况不佳，却常亲临察看修竣情况，多次在晚年日记中提及“往看尚书庙工程”。

严复为何对尚书庙修建如此关注？其为祖庙题写的诗句解开了答案：“天水亡来六百年，精灵犹得接前贤；而今庙貌重新了，帐里英风总肃然。”曾喊出“救亡图存”的严复，多么希望此时的中华民族能出现像陈文龙这样的忠贞节义大英雄，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

好友陈宝琛也多次与严复一同行香，并为尚书庙题词：“惟公节义文章是宋季第一流，不负科魁重史册；为神聪明正直惠海滨万户，永消灾患奉馨香。”同样也表达了颂扬文龙爱国情怀、为国祈福的美好愿望。



万寿尚书庙嘉庆壬戌年(1802年)碑文